

【论 文】

中国广东非洲裔外国人的国际移民¹

——累积因果视角下的移民行为研究

梁玉成²

一、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增加。因此进入中国经商、工作、旅游、学习的外籍人员数量持续增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11月1日零时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员为59.4万人，其中居住时间5年以上的有25.04万人。

中国是人口大国，自身劳动力人口的就业压力很大，历史上也从来不是移民国家。考察我国的外国人管理制度的变迁，也证明我国目前不属于移民国家。我国在198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将外国人在华居留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1985年到2004年间，中国政府共授予3000多名外国人在华定居的权利，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有50人。2004年我国政府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允许外国人在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对于年满18周岁的外国人，绿卡有效期是10年。持有绿卡的外国人，无需签证，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即可出入境。绿卡的门槛很高。根据张静(2009)的估计，2004年到现在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也就1000多人。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和广东聚集的外国人占全部的62%。其中广东所占人数最多，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且不同于北京和上海的是，聚集在广州及其周边城市的外籍人士中，非洲裔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城市。这样，一方面大量合格的外籍人士没有申请中国永久居留权；另外一方面在广州为核心的区域大量非洲裔外国人流入并滞留下来，出现了非洲裔外国人非法居留、非法入境和非法就业(官方简称“三非”)问题。

纵观很多发达国家，外来移民问题最开始都是一个边缘性的社会问题，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影响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关键性社会问题(Peter, 2002)。移民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是当代移民的主要方向，这使得发达国家基本都面临着移民和非法移民造成的大量社会问题。例如美国一直是非法移民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因此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着手了解外来移民的来华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越早越好。

在本研究中，我首先对有关理论进行讨论，然后以有关理论作为分析线索，对正在中国发生的非洲裔外国人的来华迁移的社会过程的基本模式进行描述，并将主要发现提炼出可兹检验的假设，并根据实证资料进行验证。

¹ 本文主要内容刊载于《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134-159页。

²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师。



二、国际移民理论及其在发展中国家反思

行动者为什么会进行跨国的长途迁移？他们为什么会到此国而非彼国？他们生活的环境中的什么因素导致他们作出迁移的决定和实施迁移行为。有关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

（一）国际移民的宏观理论

宏观理论有推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并非完全盲目无序的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左右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推拉模型”中，“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种种排斥力，迫使人们离家出走。它可以是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不一定是迁入地的条件比迁出地优越，而是表现出具有较多的谋生和发展机会，或者仅仅是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纵观推拉理论，它着眼于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的影响（Petersen, 1958）。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称“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Massey: 1993）。它从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入手，认为发达国家形成了双重劳动力市场：具有高效益、高保障、高福利、工作环境舒适的高级劳动力市场和低工资、不稳定、缺乏升迁机会、工作环境恶劣的低级劳动力市场。前者很容易招募到工作人员，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动力趋之若鹜；而后者则缺乏吸引力，本地劳动力不屑从事。这就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国外劳动力的内在需求，正是这种内在需求促进了人口的跨国迁移。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学说，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国际移民的推动作用。它认为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扩展、渗透，使边缘国家融入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中，边缘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因此发生剧变，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大量人口从原来封闭的社会迁移到其它地方，于是跨国移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人口迁移是人类历史中的恒远存在的社会现象。人口的跨国迁移，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原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人口跨国迁移更大的动因是殖民或者战争；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跨国移民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化分工，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空前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商品、资本、技术、服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动。作为生产和商品化要素的劳动力，必然出现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流动（Maural: 2004）。戴维·赫尔德（2001）指出：“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詹姆斯·米特尔曼认为：“全球化的表现包括生产空间的重组、产业的跨边界相互渗透、金融市场的扩大、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是“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

（二）国际移民的微观理论

解释移民行为的微观理论包含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理论和累积因果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移民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其根源在于国家间的工资差距。而人口的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最终促使移民现象消失（Stark, O. and D. Bloom: 1985）。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可疑的。例如，该理论一方面无法解释为什么大量非洲裔外国人来华的同时，为什么还有大量的中国人迁移到非洲这样的相互迁移；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解释中国既非移民国家，也不是发达国家，来华移民的违法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中国和非洲工资差异也不大的情况下，为什么大量非洲裔外国人迁移来华。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国际迁移的可能性与个人的年龄、性别、教育和技能，工作经历和婚姻状态有关，个体为了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的回报，会冒险改变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Grubel and Scott: 1966）。

新经济移民理论（Stark 和 Taylor: 1989, 1991）提出，导致迁移决定和行为的，不是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绝对收入的差异，而是行动者与参考群体比较之后得出的相对剥夺感。新经济移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迁移理论模型“将个人处于社会真空”的移民理论模式，挑战了出发地的市场的假设，将出发地市场竞争的不完善和垄断所造成的市场失败作为原因机制。

移民网络理论（Greenwood, 1971; Nelson, 1976; Massey et al., 1987）提出，移民和原居地的亲人、朋友，基于亲情、友情等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特殊联系，“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社会网或者移民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移民在出发社区和到达社区的网络关系的作用。移民的社会网有四个方面的作用：提供信息，以会降低迁移成本；降低文化适应的难度；帮助新到达的移民找到工作，并提高他们对收入的预期；移民的社会网可以帮助新来的移民节省各类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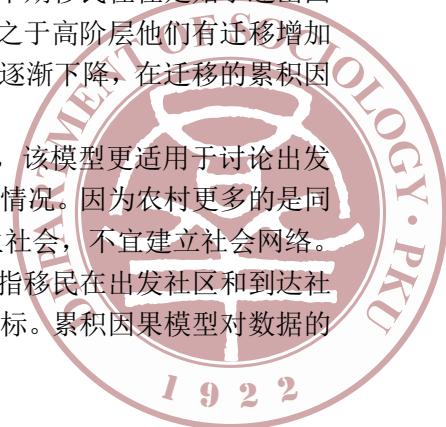
Massey 等人在移民社会资本理论上提出累积因果理论（1997; 1998; 1999a, 1999b）。他认为，当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移民成本可能因此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可能融入出发地的乡俗民风之中，而不再与早期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相关，更多的是由移民网络的联系程度以及在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等因素所决定的。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在机制，产生自身延续性（self-perpetuation）。移民网络虽不能解释移民最初的发生，却可以说明它的绵延不绝，并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移民动向。

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其他因素都慢慢变得不再重要，而移民出发地的移民网络可以自我演进，累积，并且累积因果理论认为移民行为有内在的自身延续性，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习惯”时，即使产生最初移民行为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被局外人断定为非理性的移民行为在该群体内仍会获得认可而得以延续，每一次迁移均会影响迁出国和迁入国双方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不断的增强后续的迁移。

移民网络涉及到移民从出发地到流入地的网络连接，以及移民在流入地的网络状况。网络连接对于移民的作用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作为佐证。网络连接的测量往往是移民出发地的网络连接数量或者是移民在到达地的网络连接数量。学者们提出，应该区分 3 个层次的网络连接——个体层次（弱关系）、家庭层次（强关系）和社区层次（宏观社会资本）（herman）。个体层次、家庭层次和社区层次的网络连接对于信息和资源的获取能力，以及信息和资源的质量，随着时间的累积而对移民出发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会迁移到目标国，这使得目标国和迁出国的连接日益增加。移民在目标国生活的时间越长，其能够提供给潜在的移民的信息和资源的质量也越高。

基于迁移的累积因果理论，Massey 提出了迁移在早期阶段的阶层下移现象。他考察了墨西哥移民迁移去美国的过程，发现在移民的早期阶段，从迁出地出发的早期移民往往是始于迁出国的中间阶级，比之于低下阶层他们支付得起昂贵的国际迁移费用，比之于高阶层他们有迁移增加发展机会的需求；但是随着迁移过程中社会网络的成熟，迁移成本会逐渐下降，在迁移的累积因果作用下，出现了出发国迁移的阶层出现下移的趋势。

最后，必须提及梁在等人（200）对累积因果模型的批评。首先，该模型更适用于讨论出发地是农业社会的条件下，即缺乏城市经济特征的情况下的移民外流的情况。因为农村更多的是同质性的熟人社会，易于存续社会网络；而城市更多的是异质性的陌生社会，不宜建立社会网络。其次，累积因果模型对数据的收集有移民的社会网或者社会资本，是指移民在出发社区和到达社区的网络关系。往往用移民在出发前与达到地的连接数量作为测量指标。累积因果模型对数据的



收集有较高的要求，在实践研究中一般需要适用追踪数据，使得研究上的难度增加。

对于累积因果模型，我认为还应该提出一个批评。即累积因果模型主要是讨论那些存在着迁入地—迁出地连接的迁移。对于那些不能存续迁入地—迁出地连接的迁移，则其理论立基的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对于那些源于非经济原因，尤其是政治原因，如反政府等因素迁移的行动中，因为难于存续迁入地—迁出地连接，因此该理论也未必适用。

（三）国内相关研究

中国学者近年才开展有关研究对于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外来国际迁移研究。代表性的研究为李志刚等学者的研究（2008，2009）。他们根据西方提出的“跨国社会空间”这一概念，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非洲族裔的外来移民在广州的聚居，研究分析了广州小北路非洲族裔经济区的形成机制，通过观察，他们确认非洲族裔在广州采购货物，运回本国销售，其经济活动均再生在自己种族中。因此提出：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是其外部条件，内部族裔网络是其运作的主要形式，内部族裔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背景支持着族裔成员的生活，小北路的非洲族裔经济区是一种特殊的移植性社区。

许涛（2009）的研究，同样着眼于非洲人的社会网络关系。他提出，离开非洲来到广州的过程，会使其在出发地拥有的网络断裂和弱化，因此在广州的非洲人通过强化和重构其在广州的社会关系重构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许涛分析了他们的网络，指出其内核为情感联系的亲属关系，外部为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

他们的研究都只集中在分析非洲裔外国人在华的生存策略和逻辑。对于更加完整的非洲裔外国人来华的迁移机制则几乎没有涉及。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抓住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这个关键机制。但是对这个机制是如何影响了非洲裔移民来华，以及作出移民居留在华的决定，则没有回答。

（四）理论反思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过去学术界所研究的跨国移民现象的到达国多为既是移民国家、也是发达国家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既非移民国家，也非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用于解释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从劳动力富集国家向劳动力贫乏国家迁移的宏观理论缺乏解释能力；作为非移民国家，中国基本上并不允许一般外国劳动力在中国就业，这也使得迁移的人力资本，和新经济理论难于解释大量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的非洲裔外国人不断迁移来华的现象。

而累积因果模型理论中，移民的社会网络可以自我演化，累积，并导致移民输出地的潜在移民对移民后果更高的预期。该理论在对发达国家的移民现象研究中被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移民的倾向性是移民的出发地的社会环境的函数，并且随着不断的移民的出现，不断的强化移民的倾向性。在累积因果理论中，个体的特征对于预测其移民倾向性不重要，其在出发地的社会环境更加重要。而对于后期选择迁移的行动中，个人特征日益变得不再重要。

因此，本研究试图验证累积因果理论对来华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行为的因果机制的分析的有效性。并试图获得该理论模式下，获得来华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社会空间的生产逻辑和迁移行为的因果机制。

四、广州和佛山的非洲裔外国移民的数据收集方法

（一）非洲裔外国移民的操作化测量

我们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谁是来华在粤的非洲裔外国移民。每年进出的非洲裔外国人超过 30 万，到底哪些是最终选择居留下来的移民？由于我国并非一个移民国家，几乎没有几个人得到了人长期居留身份，所以不可能以是否获得长期居留身份作为是否移民的操作化测量。如果以在华时间作为操作化测量也不合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有 25 万人在华超过 5 年，但是



几乎没有人申请长期居留身份。

通过考察主要移民国家对于入籍的要求，以美国的几类移民为例，除了符合经济能力、教育和年龄等资格之外，主要体现在2点上：时间和意愿，即申请时一般要求在入籍国；并且有自主意愿入籍（萧敬：2006）。因此我们在本研究中的操作化定义是，将选择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看做是来华的非洲裔国际移民。这个定义的合理性在于：在一个非移民国家中，移民缺乏官方的合法身份认定机制，但是并不能因为没有官方合法身份的认定就否认这个现象的存在。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来华的外国人即使在华时间很长也不一定长期在华居留的意愿，因此，对意愿的测量不能用时间。而我们选择的这个操作化定义，既包含了时间维度，也包含了意愿维度¹。

（二）数据收集情况

近些年，大量关于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非洲人聚居的报道。一方面大量非洲人在粤导致的“三非”问题，使得广东警方采取了多种治理手段，非法居留华者一旦被查获非法滞留会导致高额的罚款、遣返回国、甚至面临牢狱之灾；另一方面大量关于非洲人在粤的负面信息的传播，也导致本地居民对于他们的排斥。这也造成了非洲社群对广东本地政府机构和本地居民的相互不信任（李志刚，2009）。因此，传统的调查方法，对非洲人的研究是很困难的，甚至可能得到错误的结果。

1997年道格拉斯（1997）提出了针对少数和隐藏群体的RDS抽样方法。该方法建立在社会学行动者是通过网络连接这一社会网络基本原则之上，对传统的滚雪球抽样方法进行了改进，该方法的每一轮滚动的设计使得招募其实满足一阶马尔可夫过程（first-order Markov process），并满足两个基本规律：（1）无论调查招募到的起点种子是怎样的，足够的调查轮次之后，一定可以达到样本的均衡状态；（2）RDS抽样方法得到的一阶马尔可夫链收敛速度很快，可以迅速获得达到均衡状态的样本。由于这两个定理，研究者可以根据RDS获得的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可靠的推论。自后，RDS方法历经数次改进（道格拉斯，2002、2007；Matthew等，2002），形成了专门适用于对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意暴露身份的隐藏和稀少人口的抽样、分析和研究的研究方法（赵延东，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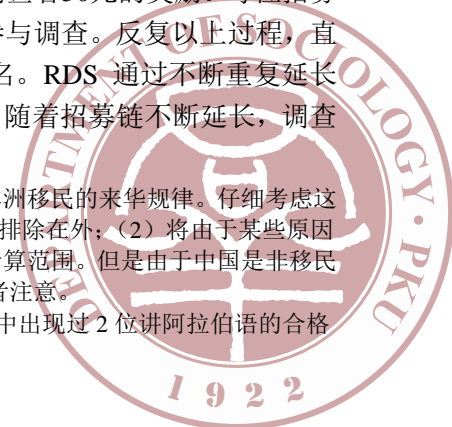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RDS方法的要点在于以下5点：（1）互惠的招募关系；（2）随机招募；（3）自我报告的网络规模以调整选择性偏误；（4）种子与新招募对象具有独立性；（5）每一个受访者招募的新被调查者数量上限一致。

非洲各国虽然语言不同，但其官方语言往往要不包含英语要不包含法语，所以此次调查使用的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²。RDS招募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寻找种子（第一位接受调查者）。种子接受完调查之后，介绍其他符合合格被调查者来接受调查，被介绍者完成调查后又继续介绍新的合格被调查者，按这样的方法样本像滚雪球一样逐渐增大。本次针对在粤的非洲裔外国人的调查自2011年7月10日开始，8月6日结束。

为了激励滚动和减少被调查者偏倚（bias），RDS方法采取双重激励，对招募者和其招募来的被调查者均给予物质奖励。我们给予招募者30元和其招募来的被调查者50元的奖励。每位招募者均发给3张招募券（coupon），其招募来的被调查者以此作为凭证参与调查。反复以上过程，直达到达到满足研究需要的样本量。招募链最长9级，招募调查对象656名。RDS通过不断重复延长招募链直至达到预定的样本量。我们的调查实践与理论预测的一致，随着招募链不断延长，调查

¹ 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关键点，依靠这样的操作化定义，我们可以前瞻性的研究非洲移民的来华规律。仔细考虑这个定义，还是存在瑕疵的，主要是（1）将那些合法居留且具有移民意愿的人排除在外；（2）将由于某些原因想离开中国而不能离开（如经济失败，负担不起离开费用）的人纳入了移民计算范围。但是由于中国是非移民国家，没有官方定义。所以这是目前唯一能尽量接近的操作化定义。提醒读者注意。

² 在调查期间，法语调查员一共有10名，英语调查员一共有9名。在正式调查中出现过2位讲阿拉伯语的合格被调查者，但是由于没有准备阿拉伯语翻译，所以无法完成访问。



获得的样本独立于种子的特征，即样本人群的各种特征将完全独立于种子。随着每一轮招募的进展，样本群体的各项特征参数均不断趋于稳定，最后不再随着招募的继续而发生改变，迅速达到了“平衡”（equilibrium）。

我们在两个均有大量非洲裔外国人聚居的区域开展了 RDS 方法的数据收集。A 调查地点选在某非洲人大量聚居的住宅小区，该小区位于城市中心区，商业交通发达，是一个外国人管理模范小区。该小区曾获中央高层领导“管理得好，服务得好”的高度评价。在政府部门的强力监管之下，该小区治安和日常的物业管理服务都非常好，导致其租金也高于附近同层次小区。其中居住的非洲裔外国人多是合法居留，经济能力较高的人员。B 地点所在的社区是一个二十多年前形成的商业小区，原来位于广州和佛山之间的城乡结合部，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在区位上属于卫星市镇的主城区，由于是很老的商业小区，显得很破败，大量业主已经搬离并将房屋出租，从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出租市场。该小区作为商业小区存在着一个维持正常功能的物业管理公司，但是由于业主多为本地居民，且多年的邻里居住，已经形成了很强大的业主社群，所以物业管理公司并不能干涉他们的出租行为。政府部门对其监管较为松散。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所以生活成本很低。B 小区的房租成本大概只有 A 小区的三分之一。大量非洲族裔外国人慢慢聚集在此。从类型学的角度看，A 地点和 B 地点代表了两类典型的非洲裔外国人的聚居地点，因此被作为调查实施地点。A 地点的调查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0 日到 28 日，共经历了 7 轮招募调查了 348 位非洲裔外国人；B 调查地点的调查时间为 7 月 27 日到 8 月 6 日，共经历了 9 轮招募调查了 308 位非洲裔外国人。由于调查涉及非法居留者，而非法居留者需要承担其法律后果，这使得本研究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研究伦理责任。本研究获得了有关监管机构的协助，使得被调查者免于因为接受调查而出现不利的法律后果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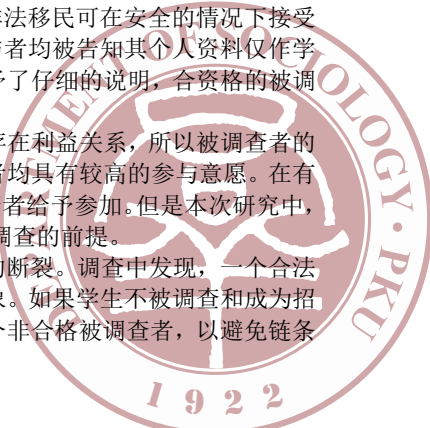
在使用 RDS 方法对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调查工作的初期，在种子招募环节遭遇了文献上没有描述过的困难。尤其是在第一个开展调查工作的 A 地点，最初招募的种子，并没有如同文献描述的一样带来足够的新的被调查者，使得整个调查难于自行滚动起来，经过反思调查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后，我们采取了街头发放种子招募券的方式开展对种子的招募²；而在 B 地点，出现了滚动速度轻微失控，略超过调查执行强度的过多非洲裔外国人在同一时间来到调查地点，导致调查质量由于赶进度而有所下降的情况。调查者还有其他文献中没有讨论过的现象需要处理³。

以下分别是 A 和 B 两个调查点的 RDS 招募链图：

¹ 非法移民是身份敏感的群体。在调查期间，有关监管部门同意为了不影响调查的可靠性和样本代表性，保持原来的执法模式，并在调查期间对调查场所及其附近减少常规巡查数量，以促成非法移民可在安全的情况下接受调查；同意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任何个体资料均仅供作者做研究使用。所有参与者均被告知其个人资料仅作学术研究在统计层面使用，并保证其个人资料的安全和隐密，研究者对其疑问给予了仔细的说明，合格的被调查者均在理解并给予口头同意的情况下才进行调查。

² 在 A 地点调查开始的最初 2 天，我们请小区保安动员合格被调查者参加，因为存在利益关系，所以被调查者的参与意愿存疑；反思之后我们改为通过街头散发招募广告的方式，以确保参加者均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在有的文献中建议，当被调查者愿意帮助研究者招募新的被调查者才视作合格被调查者给予参加。但是本次研究中，考虑到这个前提会导致本来就很弱的信任容易被破坏，所以没有设定这个参与调查的前提。

³ 在调查中发现，如果坚持只有合格的被调查者才接受调查，就会导致招募链条的断裂。调查中发现，一个合法居留者连接着一个学生，学生连接着数个非法居留者，而学生不属于被调查对象。如果学生不被调查和成为招募对象，则后门的非法居留者全部断裂而不能进入视野。因此，我们调查了 6 个不合格被调查者，以避免链条的断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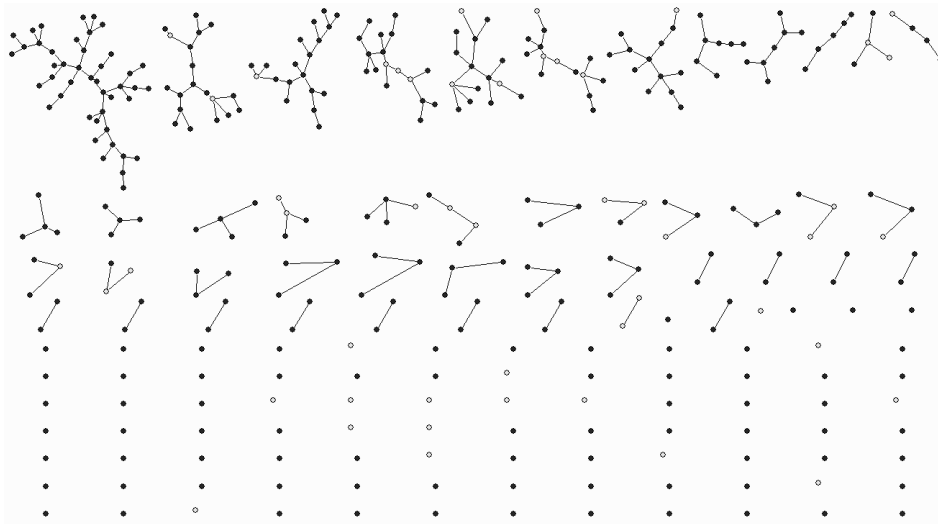


图 1、A 地点的 RDS 招募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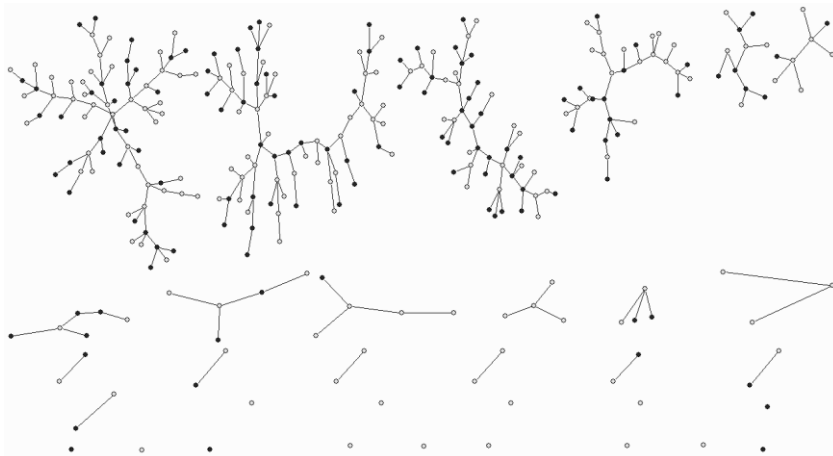


图 2、B 地点的 RDS 招募链

上图显示，RDS 方法在这两个区域的招募链有着不同的形态，具体而言，A 调查地点相对于 B 地点的非洲裔外国人具有更低的社会网络链接密度；在 A 地点的调查中共有 89 位被调查者没有帮助我们招募新的被调查者，占 A 地点全部被调查者的 25.5%；而在 B 调查地点仅有 14 位被调查者没有帮助我们招募新的被调查者，仅占 B 地点全部被调查者的 4.5%。

在图 1 和图 2 中，代表被调查者的点有两种——实心点和空心点。实心的点代表合法居留者，空心的点则代表非法居留者。图中显示 A 调查地点相对于 B 调查地点包含较少非法居留者，而 B 调查地点则有大量的非法居留者。图中清晰的表明，拥有更多非法移民的 B 调查地点的非洲裔外国人，其网络发育相对更充分，招募链更长，种子发芽率更高。

这个现象可能有三种可能所导致：一是因为行动者为了维持其社会网络而选择非法居留，二是到非法居留导致了其社会网络的发育成熟，第三种可能就是只有社会网络发育成熟的个体才能非法居留。很明显，第一种可能性是几乎不会存在的，而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性是同时存在的。我会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讨论这个现象。



五、在华非洲裔移民的基本特征及探索性描述

（一）地区分布

我们以地图来显示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国家分布。在粤非洲裔外国人主要来自于非洲西部、非洲南部等区域的 28 个国家。其中来自非洲西部的最多。根据 RDS 分析推算结果，来自非洲西部的在粤非洲人超过此比例占推算总体的 52% 左右。



图 3、调查样本的国家分布

研究由 RDS 方法获得的样本，根据不同招募轮次之间的转换矩阵进行迭代，并配之以每个个体的网络规模来修订招募造成的选择偏误，最后得到总体特征。具体计算公式可参考文献 (Salganik, 2004; Salganik MJ, 2009)，本研究使用 Stata 软件中专门分析 RDS 数据的命令来实现 (Schonlau, 2012)。

我们分析了不同来源地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的比例，见下表。可见在华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主要来自于非洲西部，占全部非洲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的接近 70%。

表 1、RDS 方法推论获得的地区分布总体特征（总体 N=656）

	合法居留	非法居留	总计
非洲东部	21.13%	3.95%	10.5%
非洲南部	15.69%	6.08%	7.1%
非洲西部	35.29%	76.90%	69.6%
非洲中部	27.89%	13.07%	12.9%
合计	100%	100%	100%

（二）样本基本特征

表 2 给出了基本的样本特征，以及使用 RDS 方法获得的总体特征。我们可以大致描绘一下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特征：女性的比例低于男性；主要来源地是非洲西部¹；非法居留比例接近 40%；绝大部分是持商务签证进入中国；讲英语的比例为 82%，法语的比例为 18%。

表 2、样本基本特征和 RDS 方法推论获得的总体特征（总体 N=656）

变量	构成比例（100%）	
	样本点估计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
性别		

¹ 本文指涉的在粤非洲裔外国人，本身就是一个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群体。在调查过程中，经常有被调查者强调自己是非洲某国人，和附近的某国人是不同的，强调自己国家的人具有某些优良的品格，而对比的国家则不具备。



男性	80.7	66.7
女性	19.3	33.3
在华居留状况		
合法居留	65.4	60.7
非法居留	34.6	39.3
来源区域		
非洲东部	15.4	10.5
非洲南部	14.0	7.1
非洲西部	45.8	69.6
非洲中部	24.8	12.9
签证类型		
旅游签证	15.7	14.0
商务签证	75.8	78.0
工作签证	1.7	1.2
学生签证	6.8	6.6
语言		
英语	72.68	81.73
法语	27.31	18.26

值得关注的是移民的性别分布。大量学者对出发国的研究都显示，早期的移民主要是男性，这些研究很多，例如 Abadan-Unat (1977) 研究的土耳其、Gordon (1981) 研究的莱索托、De Snyder (1993) 和 Boehm (2008) 研究的墨西哥、Sadiqi 和 Ennaji (2004) 研究的摩洛哥、Menjívar and Agadjanian (2007) 研究的亚美尼亚和危地马拉、Hadi (2001) 研究的孟加拉国都证明如此。因此，我们的数据中，女性比例远低于男性，显示出目前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正处于来华的早期阶段。这和目前国际上跨国移民的主要潮流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特征。从全球移民角度而言，目前出现了国际移民的女性化 (feminisation of migration) 阶段——自1980年代以来，无论单身还是已婚，均教育程度高于男性的女性，成为国际移民的主体 (Chammartin, 2007)。为了再次分析以上判断是否可信，我们分析和不同居留状态下两性的分布情况：

表 3、不同居留状态下的性别分布百分比 (总体 N=656)

合法居留				非法居留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样本点估计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	样本点估计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	样本点估计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	样本点估计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
48.91	34.18	16.96	43.68	31.79	21.64	2.31	0.49

上表的结果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从合法居留状态而言，显示出与目前国际移民流动中接近的女性为流动主体的特征，即女性所占比例超过男性；另外一方面，从非法居留状态而言，又显示出移民的早期阶段，只有很少很少的女性非法移民样本存在，用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的结果是 0.49%。这说明合法居留者与非法居留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总体。本研究的合法居留和非法居留的区分是有着移民研究的区分效度。

(三) 迁移的风险函数

本研究的核心是非法居留者，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成为非法居留者，这是研究的核心。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我们提出在一个非移民国家中，应该将移民的操作化定义为是否具有非法居留身份。这个定义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时间维度和迁移意愿维度这两个描述移民的重要特征，还使得我们下面的分析变得可能。即我们当其身份由合法居留变为非法居留，看做是“事件(event)”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即确定性的迁移行为的发生。



这样我们可以使用事件史模型来分析迁移的风险函数。原因如下：第一是因为时间事件模型有着清晰的因果。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为事件史模型（Event History Model），事件史分析法是用于分析“事件(event)”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到底受什么因素的影响。事件史分析模型优于传统的静态模型之处不仅在于它具有更好的因果推论能力，还在于它在于可以处理所谓右删节（censoring）和随时间变化变量（time-varying covariant）的问题（Box-Steffensmeier and Jones, 1997; Allison 1984; Yamaguchi, 1991）。右删节意味着事件在观察期间内尚未发生，但是尚未发生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而传统静态回归模型中，凡此情况均视为不会发生，事件史模型可以较好地解决这类由于观察时间不充分导致的问题。而随时间变化变量是指那些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变量。一般而言，研究中涉及的变量有两类，一类变量并不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如性别、教育程度等；另外一类则是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如年龄、婚姻状态等会因为观察时间的不同而出现改变。但是传统的回归模型属于静态模型，只针对一个特定的观察时点，因而不存在需要处理这种随时间变化变量带来的问题。事件史模型则可以很好的处理随时间变化变量，其方法是将分析对象在不同时间阶段或区间视为不同的个案，不同个案时在不同时间，其同一个变量的取值当然可以有所不同，因此随时间变化变量带来的问题可以轻易的被解决。

为了对非洲人在华非法居留的情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首先根据收集获得的数据来对非洲裔外国人到底何时变为非法居留状态的进行估计。在这个估计中，我们假定其他一切自变量都暂时为0（Kalbfleisch and Prentice, 1980）。并且由于没有任何非移民国家非法居留者行为的先验知识，我们不对持续合法居留的时间分布有假设，例如是单调上升，还是单调下降等。

而本文所探讨的由合法居留变为非法居留在理论上也无法假定其发生如何随时间而改变，也就是在其他条件一致下，个体选择非法“居留”下来的风险率和时间并无特定的函数关系，故将采用非参数估计方法，不假设数据的分布的Kaplan-Meier方法。Kaplan-Meier方法又称乘法极限法（product limit method），常被用来估计生存函数，是一种非参数的估计方法，不需要对理论分布做任何假设。

存活函数（survival function）是观察对象的生存时间大于某时刻的概率，它代表了非洲来粤黑人随着在华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大的非法居留的状态。即在刚来华时，其合法居留的存活率都是1，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开始出现非法居留现象，让合法居留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存活函数为不对称的单调下降的偏斜分布。Kaplan-Meier方法的计算生存率随第一次来华时间的分布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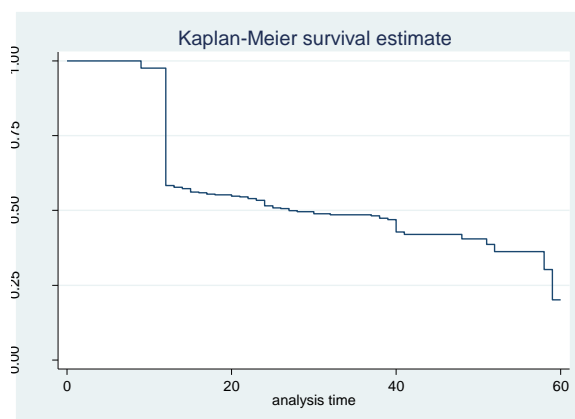


图 4、来华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非法）移民生存函数

我需要指出该图所显示的 2 个特别的方面。首先是在大致 12 个月的阶段的陡降，也就是说



有相当多的非洲裔外国人是在来华后直接选择了非法居留¹；其次是在 40 个月的后半期，生存函数的斜率有更加大的下降的趋势。

为了更加清楚显示出生存函数不能显现的部分，我做了非法居留的风险函数，来描述来粤非洲裔外国人在各个时间点上非法居留的概率。见图 3。总体来说，非法居留的风险呈现出 U 形结构。不同来华时间点上变成非法居留的概率是不同的，其中早期具有很大的概率变成非法居留；然后非法居留的概率不断下降，但是在来华 3 年以后，非法居留的概率又开始持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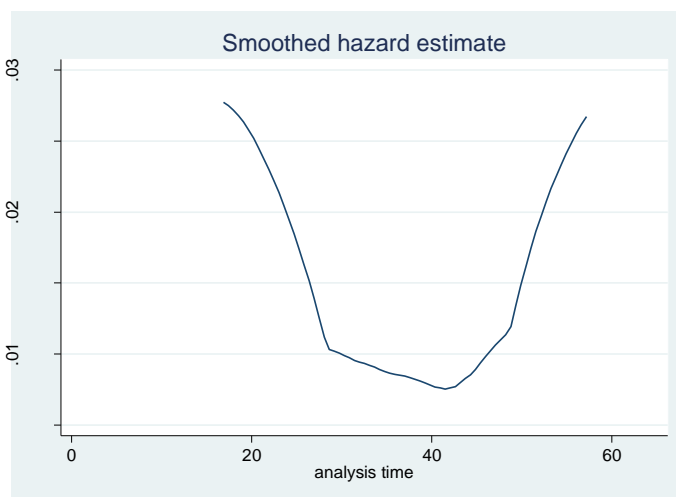


图 5、来华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非法）移民风险函数

无论是存活函数图还是风险函数图，均显示出部分非洲人来华之初就有非法居留的决心和行为，随着他们在华时间的持续，这些人越来越少；但是到了 3 年半以后，非法居留的概率又上升了。定性访谈显示这是因为选择合法居留的成本高于非法居留，并且他们已经适应了在华的生活，以及生活和工作重心移到中国之后的理性选择。查遍国际学术界对以迁移风险函数（*migration-hazard function*）的研究，只有迁移风险与居留时间之间呈现出单调下降的函数形式，完全没有发现如本研究一样获得 U 形的迁移风险函数的报告。应该说，这是非移民国家中才会出现的特有的迁移风险函数形式²。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第一次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非法居留下来的比例在抵达中国 12 个月的时候，达到 7%，而此时第二次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非法居留的比例只有不到 2%，而第三次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非法居留到 2 年后才出现，第四次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非法居留到更晚的时间后才出现。但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来华者，都一致的表现出来华超过某个时间点以后，选择非法居留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

（四）谁来中国，如何抵达广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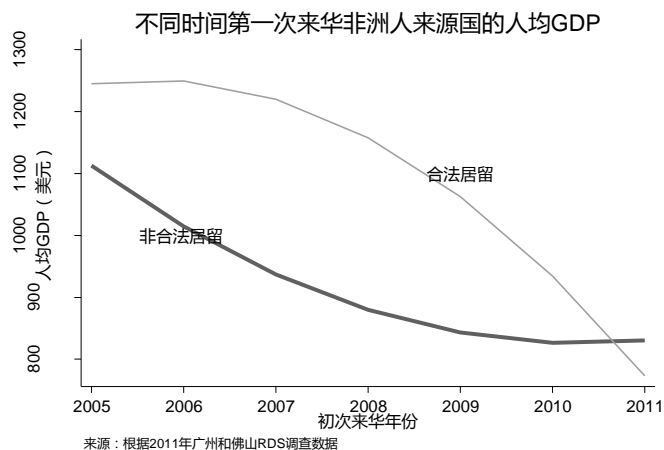
（1）谁来中国

为了简单描述来粤非洲裔外国人的基本特征的演变，我采用最简单的曲线拟合，来看看随着时间的发展，来粤的非洲裔外国人在合方面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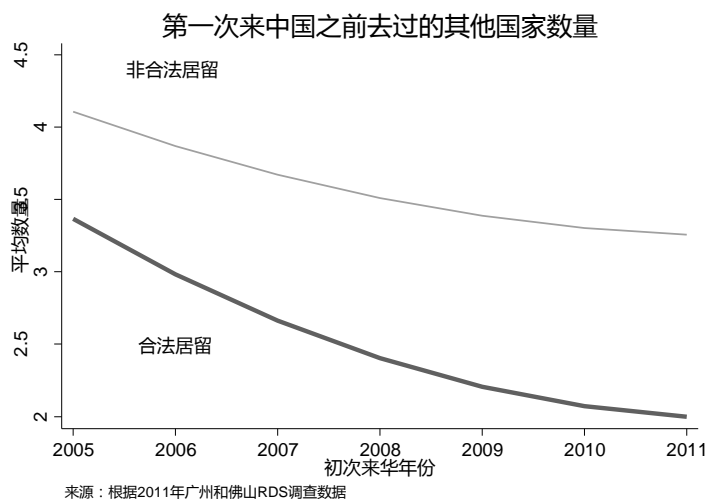
¹ 现在的国际非法移民，在入境时往往不再是非法入境，而选择风险低的合法入境。而在入境之后，不再离开，当超出居留期限之后，选择非法居留下去。在操作定义上，为了与公安部门所认定的恶意非法居留保持一致，我们设定入境后最后一次合法延期签证后 12 个月仍然没有离开为非法居留；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非法居留者，我们也认定为合法居留。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以上操作化定义，并不会导致 12 个月内的非法居留者的累积报告，显示的仍然是一入境后就选择非法居留者的数量。

² 应该说，这样的风险函数形式已经不是常见到的风险函数分布形式了。在 Keifer 总结的各种随时间变化的风险函数分布中，没有任何一种属于本研究所发现的形式。参见：Keifer, N.M. (1988)。





上图显示，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中，合法居留者来源国的人均 GDP 一般超过非法居留者的来源国。在 2008 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来华的合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越来越多是从人均 GDP 低的国家而来；而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出发国是发展较差的国家，并且不断下降，到了 2008 年之后，不再继续变差，维持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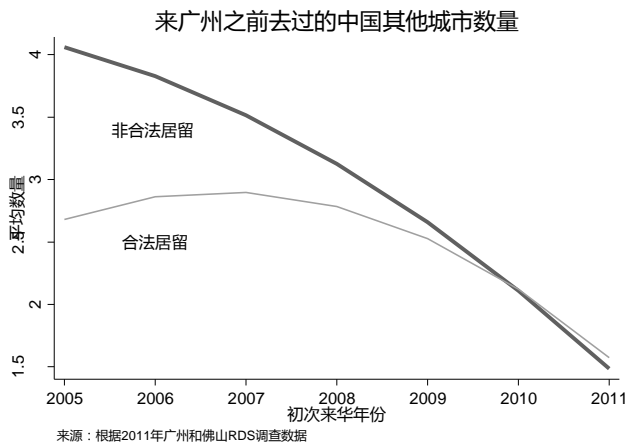
对于来粤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史的调查数据显示，他们并不是直接从非洲来中国的。在他们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们往往会先去其他的国家，大致的迁移路线的节点顺序是：非洲——北美洲（或欧洲）——中东——东亚——中国。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来粤非洲裔外国人有逐渐减少迁移节点的倾向。同时，非法居留者迁移节点数量少于合法居留者，并且其在来华前的迁移节点上的停留时间短于合法居留者。

综合以上，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往往是收入比较低（越来越低），在全世界寻找机会的人。

(2) 如何抵达广州

他们抵达中国之后，也不是直接就抵达广州，在第一次来广州之前，他们往往是沿着香港——北京（上海）——广东的路径。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早期而言，非法居留者在中国境内的搜索路径长于合法居留者，显示非法居留者并非一开始就计划聚集在广东。从整个趋势来看，到了 2011 年，他们大大减少了在中国的城市搜索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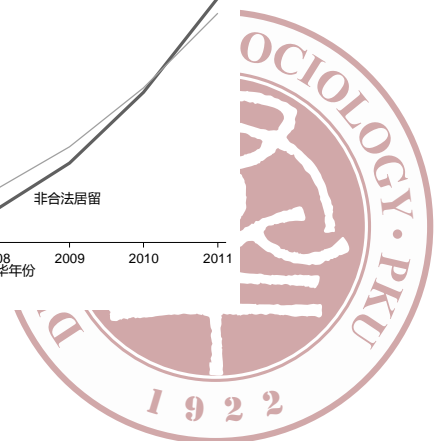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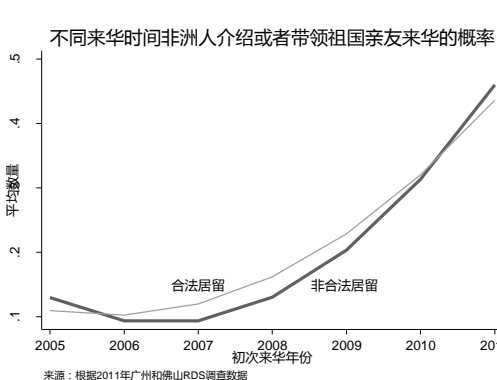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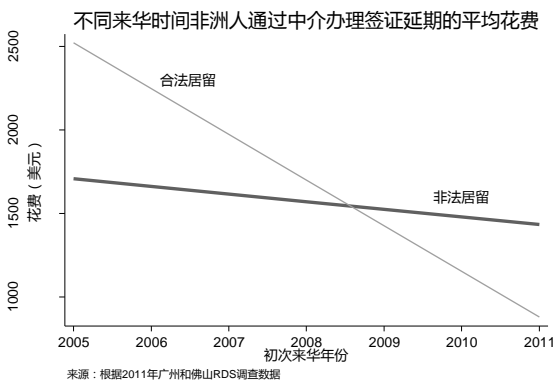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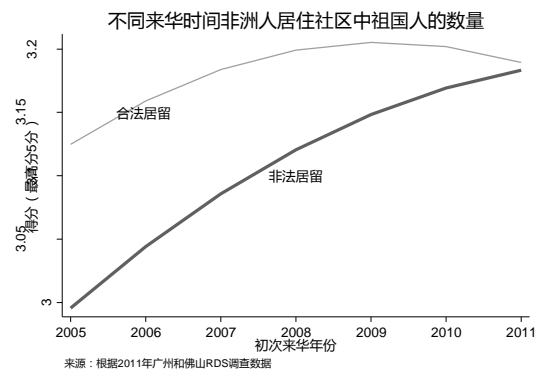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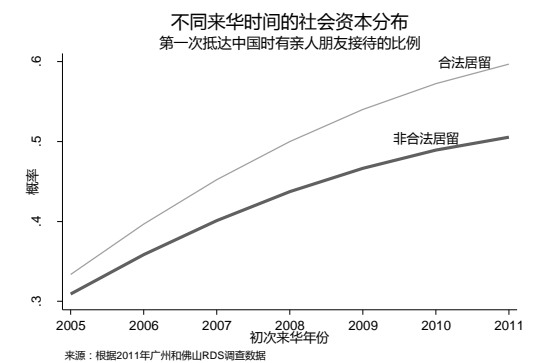


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来华的非裔外国人面对的是经济环境变差和执法日益严苛，为什么其素质越来越低呢，这么低的素质的非洲人来华，又是如何生存呢？

(六) 累积因果效应存在的初步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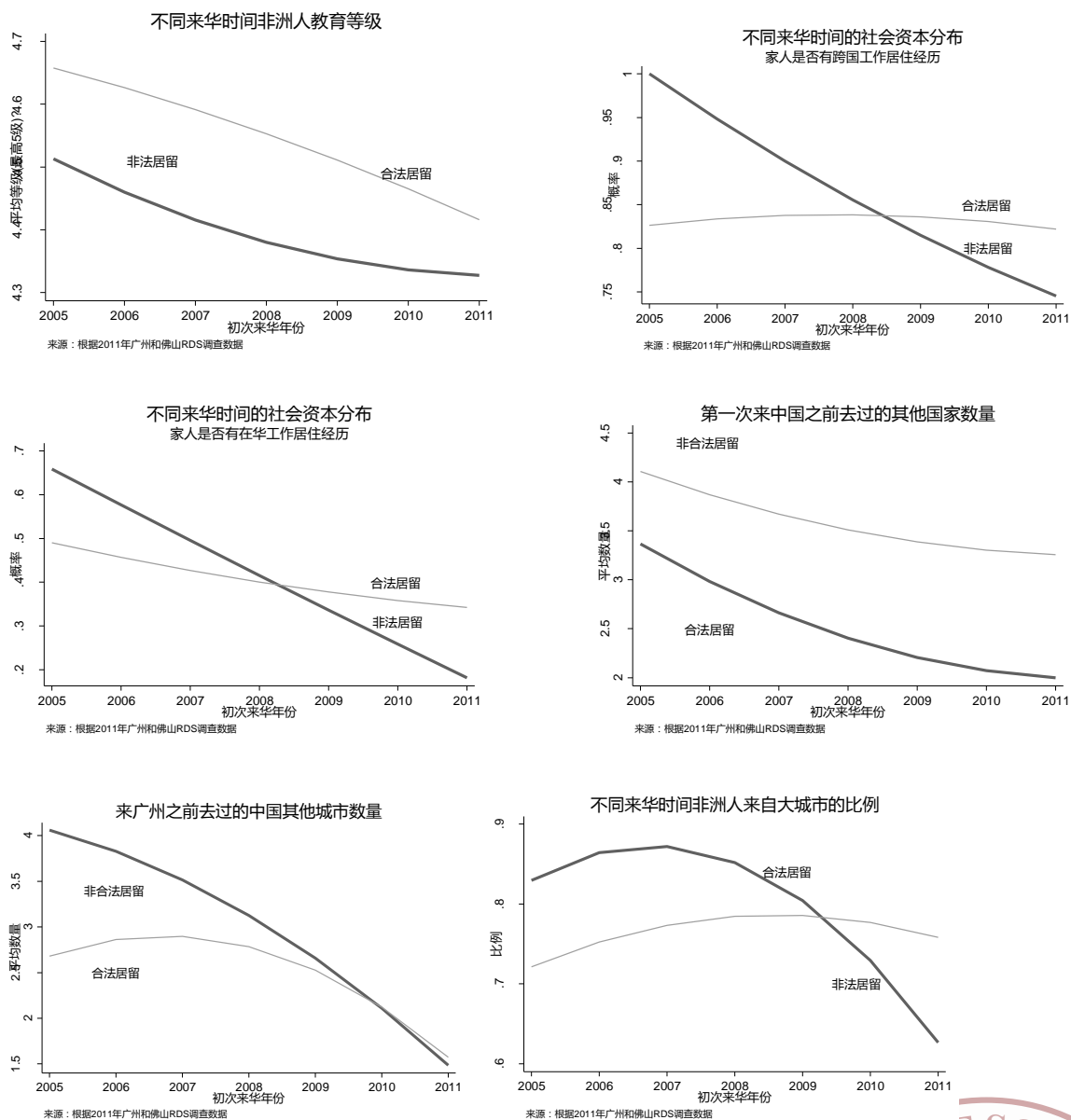
Massey 将跨国移民看做是一个动态的自我增强的过程。移民网的降低迁移成本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演变不断增强，最终将帮助越来越低下的阶层中的个体迁移。Massey 在考察了墨西哥移民迁移去美国的过程，迁移的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阶层下移现象得到证实。因此，如果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是可以正确描述中国刚刚出现的来粤非洲裔外国人的这样一个移民早期阶段的作用机制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观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的网络关系的效用不断增加、迁移成本的不断降低，以及迁移来粤的阶层不断降低等现象。

(3.1) 社会资本，及其效应上升的证据



社会资本情况：对于族裔经济和族裔居住最核心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来华时是否有人接待，认识的祖国人数均上升；而迁移的后果，以及导致未来迁移继续发生的累积因果效用——是否对家乡亲人的经济有所改善、是否带家乡的亲友来华，这些都显著上升；另外，社会网络降低迁移成本也可以通过办理延期的中介费上得到验证，中介费用的下降，证明社会资本确实使得迁移成本得到有效的下降，社会资本的确降低了迁移成本。

(3.2) 迁移过程中的阶层下降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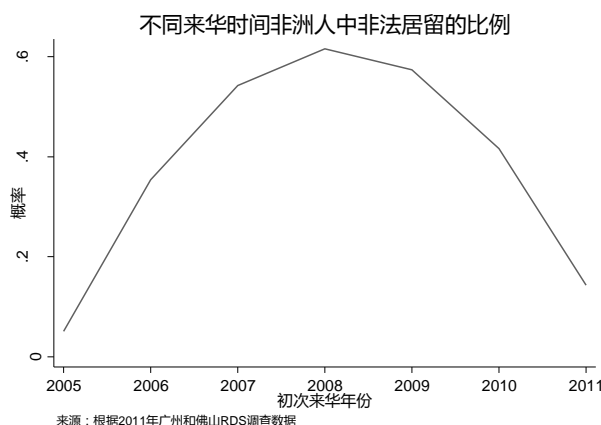
我们的确观测到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阶层下降现象。无论是合法居留，还是非法居留，随着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的不断建构，来华的风险和成本都在下降，导致了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的社会阶层不断的得以下降。

从来源地而言，随着非洲人在华适应的上升，虽然存在着经济环境的变差和警察执法环境的严苛，但是其对于家乡的经济帮助越来越多，起到了示范的作用。但是来源地来华人数，在 2008 年之后的下降，可以理解为，越来越多的人是从新的地点出发，而非老的社区，显示来华的趋势在非洲各国不断蔓延，从大城市走向小城市，走向农村。并未未来的累计因果作用积累能量。



（五）2008 年以来非法居留者来华外部环境变化分析

从不同来华时间非洲人中非法居留的比例的演变情况来看，2008 年以后，非法居留的比例大大下降。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部制度环境，2008 年的奥运会，2009 年 2 月广州非洲裔黑人在矿泉街派出所的聚集事件，2010 年广州亚运会，都使得广东警方承受了巨大的清理整顿在粤外国人的压力，对三非问题的整顿逐渐成为常态化。显然，非洲人的移民空间被不断压缩。另外一个方面是外部的经济环境。2008 年之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贸易下滑，这也影响到非洲与中国的贸易，人民币升值导致以美元结算的中非贸易中非洲进口商需支付更多的美元才能购买同样数量的货物，这些都导致在来粤非洲裔外国人在中国的发展机会有所减少。



六、有关研究假设及其验证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根据以上的探索性描述，我们基本确认了来粤的非洲裔外国人目前还处于移民的早期阶段，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效应，无论是阶层下移效应还是社会网络累积效应都可以从收集的样本中观测到。

为了进一步分析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对来粤非洲裔外国人的具体作用过程和作用机制，我延续 Massey 的研究，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角度提出研究假设。

一般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往往预言人力资本会有助于增加国际迁移的概率。但是，多位研究墨西哥到美国移民的学者的工作均发现，非法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以教育形式测量的人力资本对迁移选择的影响是负的(Massey and Garcia Espafia 1987; Taylor 1986, 1987; Borjas 1992)。显然，对于非法移民而言，无论在原有国家教育程度如何高，都不能帮助他们依靠其教育文凭寻找工作，而只能从事一些低技术工作。中国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因此并不存在移民的劳动力市场，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无法依靠其教育文凭寻找工作。因此，以教育为测量内容的人力资本应该不会有帮于增加移民的概率。考虑到来粤的非洲裔外国人的普遍教育程度不高，因此我们提出一般人力资本（教育）假设：

假设 1.1、一般人力资本无效性假设：随着迁移的过程继续，一般人力资本逐渐失去对移民迁移行为的预测能力。

显然，除了教育这样的一般人力资本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人力资本，即迁移人力资本 (Migration-specific human capital)。迁移人力资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迁移过程人力资本，帮助移民从出发地到达目的地的知识和信息的掌握能力，另外一个 Chiswick 提出 (1978, 1979, 2008) 提出的“目的地人力资本 (destination-specific human capital)”，该概念主要是指移

民在目的地的生活工作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的掌握¹；它们一起构成了迁移人力资本。显然，这些迁移人力资本会发挥着和一般人力资本不一样的功能，因此我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2、迁移人力资本的有效性假设：随着迁移过程的继续，迁移相关的人力资本仍然对移民迁移行为具有预测能力。

我们在前面已经初步证实，来粤非洲裔外国人，尤其是其中的非法居留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网络关系的效用不断增加、迁移成本的不断降低，以及迁移来粤的阶层不断降低等现象，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移民的累计因果理论是较好的分析他们来华迁移的机制。

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因此当来粤非洲裔外国人作出非法居留的决定，大致是需要涉及到几个环节。我们一一给予简单的分析。首先是在出发地，潜在移民需要有能力通过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帮助他获取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信息；其次是他所处的地区的社会网，这个网络是能够联接出发国和目的地国交往网络，会起到帮助他降低迁移过程的成本的作用。作为一个潜在移民的生活场域，显然这个网络会对他的决定施加影响，即出发地的网络将会影响他的决策，最后是潜在的移民抵达目标国之后，在目的地的移民网络，是否能帮助他适应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如果可以帮助他适应和发展，那么这个目的地的移民网络会促使潜在的移民最终决定是否真的选择非法居留下来。

在 Massey1994 年发表的研究中，他并没有区分以上过程，他的社会资本仅仅测量了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父母、兄弟姐妹是否迁移到目标国），出发地的社会资本存量（出发地社区移民到目标国的人口比例）。而中国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在粤非洲裔外国人选择是否非法居留下来，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资本就是目标国的社会资本。

从已有的文献提出，出发地中那些居住在高迁移率社区比低迁移比例的社区的人具有更高的迁移概率，原因在于社区存在的移民社会网将会从提供迁移过程的信息、在抵达地寻找工作、租房等方面帮助潜在的迁移者。但是累计因果理论是从一个较长期的角度来看，Massey 的跟踪时间长达 25 年。而中国刚刚出现这个过程，我们的研究发现，累计因果理论所描述的这个过程有着更为精细的演变。在迁移的早期阶段，行动者往往与移民社会网中的帮助者是强关系时才能得到帮助，从而实现迁移；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出发地的移民网络日益发达，这样才逐渐演变到即使是弱关系，行动者也可以获得帮助。因此，个体在出发地的社会资本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没有预测能力。而与此同时，出发地社区的社会资本中的移民社会网络的预测能力越来越强。

中国并非一个移民国家，选择非法移民有着严重的法律后果和惨淡的结局²。因此，在这样的外部约束情况下，潜在的迁移者择非法移民必须有较大的信心相信自己可以是例外。而能够给新来者以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的，只有目的地的移民社会网络。根据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在目标国居留时间越长，就越了解目标国的信息、规章制度，潜在的执法漏洞等。因此，我预测，抵达地社区的社会资本中的移民社会网络的预测能力越来越强。因此我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 2.1、个人社会资本无效性假设：随着迁移的程的继续，个人掌握的社会资本逐渐失去对移民迁移行为的预测能力。

假设 2.2、出发地社区社会资本有效性假设：随着迁移的程的继续，外在于个人之外的出发地的社区社会资本仍然对移民迁移行为具有预测能力。

¹ 在 Chiswick 的理论中，在抵达之前目的地人力资本没有作用，一旦抵达目的地，该人力资本即时发挥作用。作者对 Chiswick 的这个理论判断持批评态度。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中文掌握情况作为目的地人力资本的测量，显然，掌握中文是有助于潜在的移民作出迁移决定的，并非如 Chiswick 所认为的只有在抵达时才发挥作用。其他学者对该概念的操作化测量，如 Massey 使用是否有去过目标国家、是否在目标国家工作过等，显然会影响移民在出发国作出迁移的决策，而非如 Chiswick 提出的只有在抵达目的地时才发挥作用。当然，即使读者反对我的批评，由于我研究的对象都已经来华在粤，所以我的研究并不违背 Chiswick 提出该概念的理论假设。

² 法律后果包括罚款、遣送回国，直至坐牢；同时会并被登记在黑名单中，若干年内不能再获得来华签证许可。被登记在黑名单中意味着在华经营的网络关系和生意来往的断裂，往往导致许多年来的辛苦积累全部失去。



假设 2.3、目标地社区社会资本有效性假设：随着迁移的程的继续，外在于个人之外的目标地社区社会资本仍然对移民迁移行为具有预测能力。

由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非洲裔外国人的经济资本越高，越低的概率迁移来华。同时，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阶层下移现象，都促使我提出经济资本反作用假设。

假设 3、经济资本反作用假设：行动中的经济资本越多，将降低其迁移的概率。

(二) 基于 RDS 数据的离散重复事件史数据分析方法

时间间隔越短，模型就越精确。但是人的回忆是难于精确的，太短的时间间隔测量误差又会太大，所以我们使用月作为观察到时间间隔。在每一个离散的时间段（在本研究就是“月”）内，一个哑变量来标识事件是否发生。离散时间段被累计直到事件发生，或者被删节。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混合截面时间数据（pooled data）。这样的数据就可以使用分析哑变量的模型，那些时变和非时变变量就都可以很轻松的放在模型中（Singer & Willett, 2003）。我们这里用的模型，只是一个近似的风险率模型，因为我们的模型的因变量是发生比，而不是风险率。这个发生比是时间变量和其他变量的函数。

我们在此处使用的是多层次事件史模型。之所以使用多层次模型，是缘于 RDS 收集的数据是基于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关系的修订的滚雪球抽样方法。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在不同的网络群中，如尼日利亚族裔群落，基督教群落，五金商人群落等。RDS 抽样方法必然会出现与招募者属于同一群落的个体具有更大的被招募的概率。因此该方法在获得样本的过程中，每一个招募群组就一定会具有社会网络具有的固有群聚性（inherent homophily）。这样就存在着不可观测的组特征（例如每个招募者都是招募和自己完全一模一样的人，那么忽视这个问题会造成非常大的估计偏误）；换句话说，同一个招募者带来的被调查者，样本是非独立获得的，他们可能具有某种类似的组特性。很显然，我们无法假设这个不可观察到的组特征与我们要研究的移民选择无关¹。因此，必须使用多层次模型来消除招募网络带来的方差不独立导致的偏误。

此外，由于我设定的模型是研究个体特性（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根据 Christopher 等提出的分析原则，如果样本入样概率是自变量的函数，在分析时使用加权分析模型和不加权分析模型得到的都是一致的和无偏的估计，仅在标准误上无加权模型会较小；而如果入样概率是因变量的函数，则需要使用权重进行修订。如果样本入样概率既是因变量的函数，又是自变量的函数，则主要考虑使用因变量的权重进行修订。

本研究主要使用 RDS 方法获得样本。很显然入样概率既是自变量的函数，也是因变量的函数。根据 Christopher 等提出的分析原则，我们主要考虑使用因变量的入样概率进行修订。即合法居留者和非法居留者的入样概率的差异来修订模型²。

本研究引入“迁移（非法居留）风险率”概念，迁移（非法居留）风险率越高，表示特定时间的迁移（非法居留）可能性越高，反之亦然。本模型使用的是随机截距多层次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log it[h_x(t_{ij})] = \log_e \left[\frac{h_x(t_{ij})}{1-h_x(t_{ij})} \right] = \beta_{0i} + \beta_1 x_{1i} + \beta_2 z_{2i} + \beta_{31} t_{ij} + \beta_{32} t_{ij}^2 + \beta_{33} t_{ij}^3$$

¹ 这里，我将那些没有招募新的被调查者，即只完成自己的问卷，并没有帮助我们招募新的被调查者的人，均看作是同一个群组。显然，一定是有某些共同原因使得他们均没有招募新的被调查者，例如交往网络局限、对中国社会的信任感低等。

² 目前学术界使用 RDS 获得的数据，主要用于做隐藏和稀少群体的总体描述，用于进行因果分析的研究较少，如 Frost (2006) 等学者很巧妙的使用 RDS 数据获得的交互表来研究因果模型，但是进行复杂的多元因果模型的分析本文还是初步尝试。此处各种考虑所可能具有的局限性，提醒读者注意。



$$\begin{aligned} \beta_{0i} &= \gamma_{00} + \delta_{0i} \\ \beta_1 &= \gamma_1 \\ \beta_2 &= \gamma_2 \\ \beta_{31} &= \gamma_{31} \\ \beta_{32} &= \gamma_{32} \\ \beta_{33} &= \gamma_{33} \\ \delta_{0i} &\sim N(0, \delta^2_{\mu}) \end{aligned}$$

这里我们分析的是 t 时刻的事件的风险率或者发生比 (hazard or conditional event probability) 的发生规律。我们这里设定为随机截距模型，即不同的群组的基准 logit 风险率 (baseline logit hazard) 存在随机变化。我没有设定为更为复杂的随机系数模型，原因一是有的群组观测个案太少，不足以进行随机系数分析；二是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进行此类研究，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的设定仍需日后进一步的深入理论辨析和研究。

(三) 实证分析结果及其讨论

为了验证研究提出的假设，我们将时间、个人的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时间因为前面探索性研究发现存在 2 个拐点，所以引入三次项；个人人口学背景变量引入年龄和性别。作为一般性人力资本变量，我们引入教育等级，从没有文化到大学共 5 个等级；考虑到来华主要是进行贸易，所以我们将来华前是否经商作为一个一般性的人力资本的哑变量测量。与迁移有关的人力资本变量，我们引入来华前去过的国家数量、来粤前去过的中国城市数量作为迁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迁移性人力资本；将中文水平作为目的地人力资本。在经济资本方面，我们引入出发地是否大城市、家乡是否有住房、投资，以及出发国的人均 GDP。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我们引入家人是否有跨国迁移经历以及是否有来华经历、认识的广州人、祖国人以及非祖国的非洲人数量，以及来华时是否有人接待。社区层次的移民社会资本中，出发地的社区社会资本有 2 个部分构成，一个是移民到中国是否成为一种惯习，即测量被调查的非洲裔外国人的祖国人中非法居留在中国的比例是否高；另外一个测量迁移的出发地氛围，由测量其来华出发社区的氛围的两条题目构成，分别是来中国的人数量是否多，来华对当地人的生活是否有改善；抵达地社区的社会资本由居住社区的非洲人数量和祖国人数量来测量。

本研究使用了嵌套模型，以验证以上假设的有效性。模型 1 为基准模型，为控制变量、人口学变量和一般人力资本变量和经济资本变量；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迁移有关的人力资本变量；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之上引入个人社会资本变量，模型 4 在模型 3 基础之上引入社区社会资本变量。

由于 2008 年前后社会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导致 2008 年前后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面对不同的制度和经济环境，因此他们的行动逻辑可能存在不同，因此不应该将这两个时期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看作是一样的总体，因此，我们分别对 2008 年前后来华的群体分别做模型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5、迁移（非法居留）的多层次事件史模型

变量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2007年及之前	2008年及以后	2007年及之前	2008年及以后	2007年及之前	2008年及以后	2007年及之前	2008年及以后
时间变量								
monthid	0.136 ***	0.148 ***	0.1336 ***	0.146 ***	0.1309 ***	0.142 ***	0.147 ***	0.125 ***
monthid2	-0.00236 ***	-0.00300 ***	-0.000532 ***	-0.00295 ***	-0.000478 ***	-0.00293 ***	-0.00017 ***	-0.00251 ***
monthid3	9.34e-06 ***	1.23e-05 ***	2.25E-06 ***	1.21e-05 ***	1.88E-06 ***	1.20e-05 ***	-7.03E-06 ***	1.02e-05 ***
个人背景变量								
年龄	-0.00188	0.00459	0.00157	0.0102	0.007	0.00989	-0.0263	0.0102

性别(男性=1)	0.532	0.253	0.334	0.429	0.42	0.403	2.670**	0.469
一般人力资本变量								
教育等级	-0.0791	-0.117	-0.182	-0.0308	-0.193	-0.0705	0.0127	-0.0986
来华前是否经商	-0.428	-0.157	-0.292	-0.247	-0.403	-0.324	-1.035*	-0.38
迁移有关的人力资本变量								
中文水平			0.00197	-0.139	0.00823	-0.144	0.464	-0.111
来华前去过的国家数量			-0.169*	-0.257***	-0.167*	-0.226***	-0.277**	-0.150*
来广东前去过的中国城市数			0.213***	-0.098**	0.210**	-0.0724**	0.216**	-0.043**
经济资本变量								
来自大城市	0.646	-0.402	0.513	-0.329	0.53	-0.318	0.405	-0.283
家乡是否有住房	-0.422	-0.357	-0.463	-0.26	-0.511	-0.244	-0.792	-0.208
家乡是否有投资	-0.939***	-0.397	-0.814**	-0.328	-0.906**	-0.246	-0.685***	-0.267
出发国的人均GDP	-0.000769*	-0.00022	-0.000813*	-0.00025	-0.000797*	-0.000224	-0.000423**	-0.000337*
个人社会资本变量								
家人跨国生活迁移经历					0.448	-0.0765	0.0023	-0.208
家人是否有过在华经历					0.039	-0.538**	0.0719*	-0.370**
认识的广州人					-0.00312	0.00167	-0.0014	0.00241
认识的祖国人					-0.000723	0.00732***	0.00251	0.00889***
认识的非祖国的非洲人数					-0.000319	0.00741**	0.0945	0.659***
来华时是否有人接待					0.317*	0.0579*	0.448**	0.252**
社区社会资本变量								
祖国人口中非法居留比例							3.48**	1.062**
来华地的氛围(来中国人多不)							0.327**	-0.600**
来华地的氛围(是否有改善)							1.461***	0.0311
居住社区的非洲人多少							0.00406	0.00893**
居住社区的祖国人多少							0.00351	0.440***
常数	-2.350**	-4.90***	-2.885**	-4.20***	-2.884***	-4.85***	-3.641***	-4.001***
Random effects								
招募组层次	1.027***	1.371***	0.9623***	1.257***	0.9877***	1.318***	0.651***	1.248***
个体残差	1.541***	1.446***	1.2445***	1.368***	1.050***	1.196***	0.949***	1.022***
Log likelihood	-265.48	-726.05	-243.99	-718.07	-242.72	-710.8	-211.87	-623.719
Observations(人月)	6867	7924	6867	7924	6867	7924	6867	7924
招募组数	51	108	51	108	51	108	51	108
观测的个体数	116	511	116	511	116	511	116	51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更为精确的多层次事件史模型分析,除了基本上验证了我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之外,还有不少更为丰富的发现。首先讨论人力资本方面的假设的验证。对于预测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非法居留)行为,一般人力资本的有效性的确很低。即使在模型4中有效的来华前经商,在2008年以

后也不再显著。显示假设 1.1 得到验证。迁移有关的人力资本虽然有效，但是其作用机制和假设不同。来华前去过的国家数量越多，越不倾向于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发生。显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和非移民国家，并非是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首选。来广东前去过的中国城市数量，则在 2008 年前后有着相反的作用：2008 年前去过的中国城市越多，越倾向于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发生，而 2008 年之后则相反，这说明了广东警方的执法环境的严苛超过其他大陆城市，使得 2008 年后去过其他城市越多就越不选择在广东发生迁移（非法居留）行为。所以综合在一起，中国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迁移人力资本越多的人反而越不倾向于来中国和来粤。这是一个和过往移民理论相反的结论，但是由于过往移民理论主要研究的都是移民国家，在一个非移民国家观察到的这个新的可能的现象，还是在情理之中。

经济资本对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反作用假设得到了验证。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家乡是否有投资。在 2008 年以后，这个负向作用反而消失了，说明非洲本身经济状况也变坏，即使家乡有投资，也变得与在家乡没有投资的人一样相同的来华意愿。这预示着，非洲裔外国人的来华意愿，不仅由中国社会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决定，非洲的状况本身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个人社会资本变量虽然有部分显著，且方向与理论没有违背，但是模型 3 和模型 2 比较可以知道增加这部分变量是否有助于理解非洲裔外国人的移民过程；分析显示在模型 3 引入 6 个变量之后，比之模型 2，2007 年前的模型只改善了 1 个似然度，2008 年后的模型改善了 8 个似然度，模型均没有显著改善。显示个人的社会资本无效性假设得到了验证。

与个人社会资本变量对模型的改善无效不同，社区社会资本变量的引入大大改善了模型的拟合度 2008 年前的模型 5 个变量改善了 31 个似然度；2008 年后的模型 5 个变量改善了 31 个似然度和 87 个似然度，均为显著改善。

社区社会资本变量显示出多重作用逻辑。首先是出发地的社区移民社会资本显示有如下逻辑：在 2007 年及以前，出发地社区的移民社会资本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 2008 年以后得到了移植：出发地社区的祖国人口中非法居留比例对行动中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发生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在 2008 年后得到了抑制；出发地社会氛围的两个社会资本的测量变量在 2008 年后的作用消失，甚至成为负向作用，显示 2008 年以后非洲裔外国人在粤的处境被如实通过网络传达到其出发国，网络传达的真实信息使得迁移得到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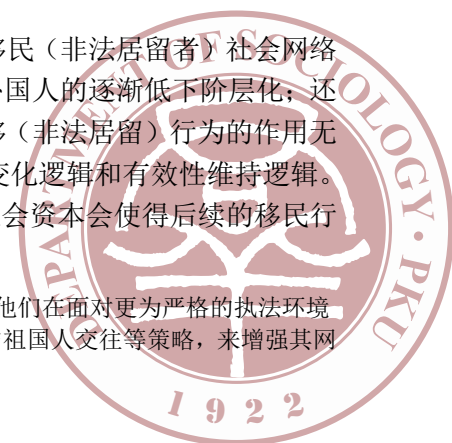
抵达地的社区社会资本由居住社区的非洲人数量和祖国人数量来测量。模型显示中国广东作为抵达地区的移民社会资本的作用，在 2008 年之后的作用得到了加强，显示非洲裔外国人在 2008 年后面对严苛环境，改变的社会资本的构建逻辑大大增强了其社会资本对其迁移行为的效应¹。

七、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的分析显示，中国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来华在粤的非洲裔外国人的移民正处于国际移民的早期阶段，一个跨越中非之间的移民网络正在迅速形成。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可以较好的用于分析这个过程。

本研究不但验证了该理论所预测的很多现象，如非洲裔外国人移民（非法居留者）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有效性、个人的人力资本的无效性，来华在粤非洲裔外国人的逐渐低下阶层化；还丰富了这一理论，如进一步分析了个人社会资本对非洲裔外国人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作用无效，以及社区社会资本的效应不断上升，以及社区社会资本建构的变化逻辑和有效性维持逻辑。与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一致，移民社会网络为核心的移民社会资本会使得后续的移民行

¹ 本研究专门分析了 2008 年后在粤的非洲裔外国人在粤的社会资本构建，显示他们在面对更为严格的执法环境下，改变了其社会交往网络的构建逻辑，更多的采用了分散居住、更紧密的与祖国人交往等策略，来增强其网络的功能。限于篇幅限制，这个部分没有涵盖在本文中。



为将得到自我加强和自我演化。并且会随时因应外部环境的需要而改善其构建逻辑，从而不但维持，而且不断增加其有效性。

全球化的贸易分工体系，劳动力的流到，和资本的流动，以及跨国贸易是交织在一起的，就是会不断的产生人的跨国流动。只要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接下来的移民将如同滚雪球一样的自行不断加强和拓展，从而终有一天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压力群体。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到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的阶段，老龄化社会初见端倪。纵览世界各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和老龄化都需要通过移民来给予舒缓。引入相对于中国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外国年轻劳动力，也许是未来才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国际移民，虽然是非法移民，却已经悄悄的出现。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其非法移民也是最严重的国家。我国提出要在本世纪前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随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的上升，移民问题将会逐渐从一个边缘性的社会问题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应该尽早开始有关研究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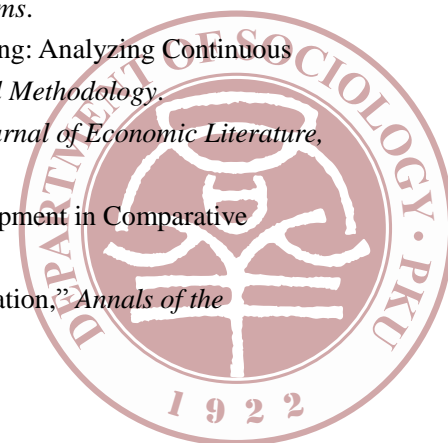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不想仅仅停留在学理层次。基于上面的研究，我们尝试给出如下政策建议：对于带来贸易和资本的非洲裔外国人给予更多的居留合法性认定和制度便利；对于与中国低层次体力工人竞争的低层次体力劳工，给予更严格的执法环境；抬升准入者的社会阶层，抑制流入者的阶层下降速度和规模。

参考文献：

- 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李志刚、薛德升，Michael Lyons, Alison Brown,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地理学报》2008，63（2）：207-218;
- 李志刚、薛德升、杜枫、朱颖，“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地理研究》2009，28（4）：920-932
- 萧敬，2006，“美国移民三种类别”，《21世纪》2006/09
- 许涛，“广州地区非洲人社会支持的弱化、断裂与重构”《南方人口》2009年4期。
- 许涛，“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青年研究》2009年第5期。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译，《转型中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评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张静，“中国‘绿卡’发给谁”，《决策探索(上半月)》2011年第06期
- 赵延东，J·Pedersen，2007。“受访者推动抽样：研究隐藏人口的方法与实践”《社会》2007年第2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主要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9_402722560.htm
- Abadan-Unat N. 1977, “Implications of migration on emancipation and pseudoemancipation of Turkish wome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1(1): 31.
- Allison, P. D. 1984, *Event History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Becker, G.S., 1975, *Human Capital* (2nd edi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oehm, D.A. 2008, “ ‘ Now I am a man and a woman’! Gendered moves and migrations in a transnational Mexican communit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35 (1):16.
- Box-Steffensmeier, J. M., & Jones, B. S. 1997, “Time is of the Essence: Event History Models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pp. 336-83.
- Chammartin G., *The femin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rogramme*, ILO; *Feminisation of migration*, 2007, 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INSTRAW) 报



- 告。
- Chiswick, Barry R. 1979, "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Immigrants: Some Apparently Universal Patterns," IN William Fellner, ed., *Contemporary Economic Problems*, 1979, pp. 357-399.
- Chiswick, Barry R. 1978, "The Effect of Americanization on the Earnings of Foreign-Born M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 897-922;
- Christopher Winship, Larry Radbill, "Sampling Weight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23 (2) .
- De Snyder, V. 1993, "Family life across the border: Mexican wives left behind,"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5(3): 391.
- Douglas S. Massey and Kristin E. Espinosa, 1997, "What's Driving Mexico-U.S. Migration? A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Policy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2, No. 4 (Jan., 1997), pp. 939-999.
-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19, Issue 13 (Sep., 1993), 431-466.
- Ennaji, M. and Sadiqi, F. 2004, "The impact of male migration from Marocco to Europe on women: a gender approach," *Finisterra: Revista Portuguesa De Geografia* 39(77): 59-76.
- Frost SD, Brouwer KC, Firestone MA, Ramos R, Ramos ME, Lozada RM, et al. "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 of injection drug users in two U.S.-Mexico border cities: recruitment dynamics and impact on estimates of HIV and syphilis prevalence,"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2006; 83(6) Suppl: 83 - 97.
- Goel S, Salganik. MJ ,2009,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as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Statistical Medicine*, 28: 2202 - 2229.
- Gordon E. 1981,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the lives of women in Lesoth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7(3): 59-76;
- Greenwood, Michael J., 1971,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igration to Urban Areas of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ase of India,"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1):253-262.
- Grubel and Scott, 1966,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268-74;
- Hadi, A. 2001,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change of women' s position among the left-behind in rural Banglade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7: 53-61.
- Heckathorn, Douglas D. 1997,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dden Populations," *Social Problems*.
- Heckathorn, Douglas D. 2002,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II: Deriving Valid Population Estimates from Chain-Referral Samples of Hidden Populations," *Social Problems*.
- Heckathorn, Douglas D. 2007, "Extensions of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Analyzing Continuous Variables and Controlling for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 Keifer, N.M. 1988, "Economic Duration Data and Hazard Fun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June): 646-679.
- Massey, Douglas S. 198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383-414.
- Massey, Douglas S. 1990a,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Immigr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10: 60-72;



- Massey, Douglas S. 1990b, "Social Structure,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Index* 56: 3-26.
- Massey, Douglas S. 1995, "The New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1:631-52.;
- Massey, Douglas S., Rafael Alarcón, Jorge Durand, and Humberto González, 1987, *Return to Aztlan: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Western Mexic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ural, Toro-Morn, and Marixsa Alieea, 2004, *Utionandlmm Zgration: A Global View*, London: Greenwood Press.
- Menjívar, C. and Agadjanian, V. 2007, "Men's Migration and Women's Lives: Views from Rural Armenia and Guatemal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8(5): 1243-1262.
- Nelson, J., 1976, "Sojourners versus New Urbanit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emporary versus Permanent Citywar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4:721-57.
- Peter Stalker, 2002,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xford, UK: New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 Salganik, Matthew J. and Douglas D. Heckathorn, 2004, "Sampling and estimation in hidden populations using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Social Methodology* 34:193 - 239.
- Schonlau M, Liebau E,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The Stata Journal*, 2012; 12(1): 72-93
- Singer, J. D., & Willett, J. B. 2003, *Applied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Modeling change and event occurre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ark, O. & Taylor, J. E. 198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mography*, 26:1-14.
- Stark, O. & Taylor, J. E. 1991,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migration: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olicy, Research, and External Affairs Working Papers—656, World Bank.
- Stark, O. and D. Bloom,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173-178.
-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Chiswick, Barry R, 2008,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f-Selected? An Economic Analysis," in Caroline D.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Routledge, Second Edition, 2008, pp. 63-82.
- William Petersen, "A General Typology of Mi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3, No. 3 (Jun., 1958), pp. 256-266
- Yamaguchi, K. 1991, *Event History Analysi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
- Zai Liang and Miao David Chunyu, Guotu Zhuang and Wenzhen Ye, "Cumulative Causation, Market Transition, and Emigration from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706-737.

